

中国减贫与发展道路

——后扶贫时代新贫困治理与反贫困社会工作发展路径

齐彩红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 青岛 266520

DOI:10.61369/SE.2026030039

摘 要 : 中国于2020年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 贫困治理由此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返贫风险防控和发展能力提升为重点的新阶段。伴随减贫战略的演进, 社会工作在扶贫实践中逐步由行政辅助走向专业参与, 并在精准扶贫阶段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进入后扶贫时代, 贫困主体、贫困表现和风险特征均发生明显变化, 新贫困呈现出多维化、个体化、长期化和风险化趋势。面对这一转变, 反贫困社会工作需要重新明确自身定位, 进一步回归专业、回归服务、回归个体, 通过精准服务、社区赋能、多元协同和长效机制建设, 提升贫困治理的持续性与有效性。

关 键 词 : 中国减贫; 后扶贫时代; 新贫困治理; 相对贫困; 反贫困社会工作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 New Poverty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Anti-poverty Social Work in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Qi Caiho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20

Abstract : China eradicated absolute poverty under the current poverty standard in 2020, marking a major shift in its poverty governance agenda. Since then, poverty governance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that focuses on relative poverty, the prevention of poverty recurrenc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people's development capacity. Alo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social work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an administrative supporting role to a more professional and service-oriented role in anti-poverty pract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work accumulated important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however, the targets, forms, and risks of poverty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New poverty is increasingly characterized by multidimensional, individualized, long-term, and risk-based features.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nges, anti-poverty social work needs to further clarify its professional position and strengthen its focus on individuals and services. By promoting targeted services, community empowerment, multi-actor collaboration, and long-term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social work can improve the sustain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governance.

Keywords :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post-poverty alleviation era; new poverty governance; relative poverty; anti-poverty social work

引言

贫困治理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 也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新中国成立以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通过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和长期扶贫实践, 显著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状况, 并于2020年底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中国减贫道路经历了由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由普惠性治理到精准扶贫、由解决生存问题到推动全面发展的深刻转变, 体现出国家主导、制度保障与社会协同相结合的鲜明特征^{[1][2]}。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社会工作也逐步进入减贫与发展领域。早期扶贫工作主要依赖政府主导和行政动员, 社会工作专业属性并不明显。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参与等机制的发展, 社会工作在资源链接、需求识别、能力建设、社区参与和心理支持等方面的专业优势逐渐显现。在脱贫攻坚阶段, 社会工作不仅在贫困家庭帮扶中发挥了补充和延伸作用, 也在社区治理、公

作者简介: 齐彩红(2000.11-), 女, 汉族, 山东德州, 硕士研究生在读, 青岛理工大学。研究方向: 社区社会工作。

共服务衔接和特殊群体支持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3]。

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已经终结。进入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对象、目标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过去以收入不足和基本生存困难为主的贫困问题，正在转向相对贫困、多维贫困和返贫风险并存的新格局；贫困治理的重点也由“脱贫”逐渐转向“防贫”“稳贫”和“促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识新贫困的主要特征，如何重新定位社会工作的角色功能，如何探索更加符合后扶贫时代要求的发展路径，成为值得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

一、社会工作参与中国减贫的多维实践模式

在中国减贫进程中，社会工作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在不同阶段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实践模式。

首先，在精准扶贫阶段，社会工作主要围绕“精准识别—精准介入—精准评估”的逻辑展开服务。社会工作者通过入户访谈、需求调查和个案管理，识别贫困群体在收入、教育、医疗、就业、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具体困难，并开展有针对性的介入。这种介入方式不仅强调政策落实，更强调对服务对象生活情境的理解，使扶贫工作由单纯资源输送逐步转向能力建设与综合支持。

其次，社会工作在社区减贫中发挥了资源整合和赋权增能的作用。相较于单向度的行政下沉，社会工作更加重视挖掘社区内部资源，培育社区组织和骨干力量，推动居民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激活地方文化、人力、组织和关系资源，社会工作不仅改善了部分贫困群体的生活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自主治理能力。

再次，在特殊类型贫困治理中，社会工作体现出较强的专业优势。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群体而言，问题往往不只是收入改善，还包括环境适应、社会融入、邻里关系重建和心理调适；对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而言，社会支持不足、情感照顾缺失和家庭功能弱化同样是重要困境；对于部分女性贫困群体和城市相对贫困人口来说，其问题还涉及教育机会不足、劳动市场处境不利以及社会排斥等因素。社会工作通过心理支持、关系修复、社会融入、权利倡导和资源链接等方式，超越了单纯经济救助的局限，体现出较强的人本性和综合性^{[4][5]}。

总体来看，社会工作并不是对政府扶贫的替代，而是在国家主导的减贫框架下，以专业服务回应政策难以充分覆盖的个体和社区需求，推动贫困治理由“外部帮扶”向“内生发展”延伸。

二、后扶贫时代新贫困治理的主要特征

后扶贫时代当中，贫困不再主要表现为大规模集中性的绝对贫困，而是更多呈现为相对贫困、多维贫困和风险性贫困，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更上一层，治理方面难度更上一层。

贫困主体表现出更多的多元性，绝对贫困被消除以后，农村低收入者们、残疾人、长期患病者、孤寡老人、“三留守”群体还有就业不稳定的农民工等，更有陷入相对贫困的倾向，部分虽

已脱贫可发展基础较为脆弱的家庭，还是处于贫困边缘状态，一旦碰上疾病、失业、灾害、教育费用变多等情况，就可能又一次陷入贫困^{[6][7]}。后扶贫时代治理对象已不局限于传统概念里的贫困户，而是扩大到更广泛的脆弱性人群。

贫困呈现从收入不够转向多维剥夺的情况，贫困识别主要把收入和物质标准作为重点，这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有比较强的适用性；但在脱贫之后的时代，只凭借收入，无法全面体现个体和家庭的实际情况，一些群体从统计的意义来讲已脱贫，但在教育机会、健康保障、社会支持、就业质量、发展能力和主观满足感等方面还是处于明显劣势，新贫困更着重贫困的综合性及持续性，也需要治理方法从单一救助转向综合帮扶。

贫困风险进一步突出，后扶贫时代的治理不光要关心已经贫困的人，还要关注有可能返贫致贫的人，有些群体虽说去除了贫困标签，但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比较差，要是缺乏稳定的收入、切实的社会支持和持续的政策支持时，已有的发展成果有迅速流失风险，长期依赖外部救助也可能造成部分群体形成较强的风险敏感和心理脆弱情况，在行政力量逐步退出之后，遭遇更大的不安全感 and 焦虑感受，贫困治理不只是属于经济问题，还涉及社会心理跟发展能力相关的问题。

新贫困治理的重点要从短期脱贫转向长远发展，由物质帮扶转向能力培育，从事后救助调整为风险预防和持续帮助。

三、后扶贫时代社会工作的重新定位

在开展脱贫攻坚工作阶段，社会工作较多担当配合政策执行的“半行政”角色，它的工作目标、节奏还有考核方式都跟行政任务紧密相连，这种定位在集中攻坚期是有现实合理性的，由于要解决大规模绝对贫困问题，国家要高效率地动员各类力量，社会工作也借助此情况广泛进入扶贫工作领域。

步入后扶贫时代之后，贫困问题的性质已经有明显的变动，普遍又集中的贫困逐步降低，个体、差异和隐蔽性的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倘若社会工作仍停留在完成项目以及指标落地的层面，就难以充分满足新贫困治理的实际情况，社会工作必须重新审视、校正自身定位。

社会工作要把导向从治理导向变为服务导向，后扶贫时代更要着眼于服务对象的实际处境开展持续支持，而不是只围绕项目要求和考核指标去开展任务，服务对象的需求勘别、主观感受认知和生活质量面貌，应是社会工作要着重关注的点。

社会工作要把优先重点从效率优先切换到能力建设优先，减

轻贫困是一个长期进程，仅用短期成效或量化指标对服务效果加以衡量，容易使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被削弱，后扶贫时代更应该助力贫困群体提升自我发展、资源整合和抗风险的水平，使他们慢慢从被动接受帮扶转为主动参与建设。

社会工作要从偏向宏观干预合理回归个体关怀，新贫困有着更明显的差异性与隐蔽性，统一化服务模式难以满足多元需求，社会工作要更多重视个体生活史、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网络和主观体验，以尊重服务对象主体性为基础开展差异化、陪伴式服务^[8]。

社会工作要增进专业自主水平，脱贫之后的时代，社会工作还是要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但不可只是行政工作的附属内容，而应借助专业理念、方法以及伦理，成为新贫困治理当中的重要服务力量和社会帮扶力量^[9]。

四、后扶贫时代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

面对新贫困治理的新任务，反贫困社会工作需要在实践理念、服务方式和制度建设上进一步优化。

第一，坚持做好精准服务，拉动内源发展，社会工作要按照不同群体的状况差异开展分类介入，就低收入家庭而言，需加强就业方面支持、教育方面帮扶和生活规划；对老年朋友、残疾人和长期生病者，应提供更持续不断的照顾支撑和资源对接；对有返贫隐患的家庭，需进一步做好动态监测、风险评估和预警干预，社会工作不能只是停留在输送外部的资源，也要引发服务对象的内在动力，辅助其认识自身所长，提高改变生活的信心及能力。

第二，将社区作为根本来坚持，加大能力培育，社区是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主要场域，社会工作要积极参与到社区关系网络，孵化社区组织和互助机制，带动居民投身社区事务及公共生活，利用增强社区凝聚力、包容性和韧性，能够提高居民一起应

对贫困风险的能力，削减个体在面临困境时孤立无援的状况。

第三，强化资源之间的链接，推动多元合作开展，后扶贫时代里贫困问题带有综合性，单靠单一主体很难有效应对，社会工作要充分发挥协调跟链接的优势，促使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和家庭搭建合作格局，达成制度资源、社会资源和社区资源的有效对接，增强服务供给的连贯性和精确性。

第四，突出专业长处，带动本土发展推进，社会工作要持续提高需求评估、个案管理、危机干预、社区动员还有资源整合等专业能力，要立足于中国减贫方面的经验和基层治理实践，在应用、反思及修正当中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反贫困社会工作模式，使专业发展更符合中国现实需求。

第五，强化制度支持，建设长效机制。政府应通过岗位设置、人才培养、购买服务和项目支持等方式，为反贫困社会工作提供稳定制度保障，推动其由阶段性参与走向常态化和制度化发展。只有形成长效机制，社会工作才能在后扶贫时代持续发挥作用。

五、结语

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中国贫困治理已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和返贫风险防控为重点的新阶段。新贫困在主体构成、表现形式和风险特征上的变化，对传统治理方式和社会工作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为重要的专业力量，社会工作应在后扶贫时代进一步强化服务导向和专业优势，围绕能力建设、社区支持、资源整合与多元协同，提升反贫困实践的精准性、持续性与制度化水平。由此，社会工作方能更有效地服务于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与促进社会公平的现实目标。

参考文献

- [1] 向德平，罗珍珍. 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发展：专业取向、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J]. 社会工作, 2020, (06): 4-13+108.
- [2] 雷明. 扶贫战略新定位与扶贫重点 [J]. 改革, 2016, (08): 74-77.
- [3] 杨晓玲. 社会工作参与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可行性研究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1, 32(03): 105-106+126.
- [4] 张和清. 社区文化资产建设与乡村减贫行动研究——以湖南少数民族 D 村社会工作项目为例 [J]. 思想战线, 2021, 47(02): 21-29.
- [5] 马凤芝. 贫困治理与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的中国实践 [J]. 社会建设, 2022, 9(01): 48-59.
- [6] 岳依泉，王卓. 女性贫困化：维度、成因及其帮扶——基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研究与展望 [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50(03): 102-109.
- [7] 汪三贵. 探索贫困群体主动脱贫的中国路径评《中国脱贫之路：基于贫困户的经济决策质量的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02): 2.
- [8] 向德平，向凯. 多元与发展：相对贫困的内涵及治理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34(02): 31-38.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20.02.06.
- [9] 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 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 [J]. 社会学研究, 2008, (06): 174-193+246.DOI: 10.19934/j.cnki.shxyj.2008.06.009.